

工业领域和工作场所的参与式民主 ——卡罗尔·佩特曼对参与式民主实践途径的探索 及其启示

□李 鹏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州 510053]

[摘要] 自由主义对古典民主的改造和对公民参与的漠视不仅导致自由主义民主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严重危机,也使民主本身失去了活力。为了应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卡罗尔·佩特曼主张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公民参与,认为公民参与的实践应当由经济领域开始,并逐步向政治领域扩展,以实现一个完全民主化的参与性社会,标志着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兴起。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对当代中国的民主实践提供了镜鉴。

[关键词] 佩特曼;民主;参与;自由主义民主;参与式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2)04-0102-06

一、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与参与式民主的兴起

在民主理论的传统中,参与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古希腊公民亲自参与决策、共同决定公共事务的城邦民主被认为既服从理性主义又服从经验主义的原则,长期以来就被视为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光辉典范。近代以后,伴随着封建集权向以代议制为核心的现代民主的转变,普选制替代了有限选举成为代议制民主的基础,而工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大众教育水平,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公民素养和政治认知能力日渐增强,市场经济消除了各种政治依附关系,培育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和新型的公民,他们迫切地希望依靠政治参与的资格来实现社会承认,希望通过政治参与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毫无疑问,现代政治以公民参与范围和程度的扩张为特征,公民参与不仅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且还成为判定现代国家合法性强弱以及民主化程度的重要准绳之一。

然而,随着自由主义统治地位的巩固,自由主义一改反封建、反专制斗争历程中对公民参与的支持态度,惧怕公民参与的扩大会危及自由主义本身的统治,转而开始限制和排斥公民参与。这一方面

突出地反映了以公民参与为核心的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张力:自由主义关心的是权力的限度问题,而民主关心的是谁获取权力的问题。在自由主义看来,公民参与的无限扩张将带来迟滞不前的巨型民主和普遍平庸的平民政治,由此导致的多数暴政必将随意践踏个人自由的神圣领域,因为公民参与无限扩张的目标在于落实人民主权的原则,即建立起一个一切公民平等地决定公共事务,平等地参与政治,一切都由公民亲手来做的国度,在这样的国度中“公民被要求完全服从于国家的主权,个人为了民族的自由而被要求完全服从”,其后果将是权利领地的丧失和个人自由的毁灭^[1]。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民族国家所建构的现代政治生态背景下,诞生于城邦小国的古典民主在回应现代民主的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和困境。

在经典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现代民主只能是代议制,以参与为核心的古典民主理想早已成为不切实际的“神话”。因此,以熊彼特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家主张抛弃古典民主的参与理想,从代议制民主的实际出发重新界定民主的概念。在熊彼特看来,“民主是一种方法,也就是讲,民主就是为达到——立法或者行政方面的——政治决定而实行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在这种政治安排

[收稿日期] 2011-09-09

[作者简介] 李鹏(1984-)男,厦门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获得做出决策的权力。”^{[2]3-4}如果说古代民主的实质是“选民决定政治问题”,那么现代民主的核心则只能是“选举做出政治决定的人”,因此,熊彼特否认现代民主需要人民政治的参与或者统治,认为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政治家的统治,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的作用只在于“接受或者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3]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重新界定奠定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同时也为自由主义继续排斥公民参与提供了依据。

尽管如此,要求复兴古典民主理论实质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许多学者质疑以熊彼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对公民参与的排斥阉割了民主的真谛,认为自由主义对民主的过分修正扩大了普通公民与代表之间的鸿沟,不仅导致了西方国家普遍的政治冷漠,也导致自由主义民主始终面临合法性衰退的威胁。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已然已经演变为一种扼杀公民创造性与积极性、严重压制个人自由的“空壳民主”,这种空壳民主区别于“实质民主”。后者以古典的民主观念为核心,主张民主的要义就在于参与决策,公民个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每个人都与公共事务密切相关,因为每一个人的利益与偏好只有他个人最清楚,这才是民主价值的真谛;而前者以公民政治认知和政治技能不足为借口,极力降低公民参与的领域和水平,认为过多的公民参与不仅降低了政治系统的效率,也危害到政治系统的稳定,进而主张公民参与的功能仅在于选举代表,民主的功能就在于通过代表环节来稀释“群氓”的无知与躁动,作为政治过程的关键——公共决策实际上与普通公民无关。自由主义民主的空洞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诡吊的是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近乎反民主,却依然被冠之以“民主”的称号,成为当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一大悖论。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世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终结了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世界持续的繁荣与稳定。在“新左派”的鼓舞下,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劳工阶层不满无权状况,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增强自身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在经济领域,劳工控制工业运动兴起;在政治领域,普通公民要求在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参与政府决策制定的过程。然而,自由主义民主却在如何应对这种新的趋势面前无能为力。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陷入全面危机。在这一背景下,1970年,卡罗尔·佩特曼出版了《参与和民主理论》,分析了自由主义民主危机的根源,主张复兴公民参与在民主理论与实践中的原有地位,以修正自由主义民主的弊端,标志着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出现。

二、参与式民主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修正

在佩特曼看来,自由主义民主面对危机之所以无能为力,关键就在于其理论和实践把“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限定为投票选举领导者。……在熊彼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参与没有特殊或关键的地位。”^{[2]4-5}因此,修正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缺陷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重新回到民主的实质,通过扩大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让公民在参与的过程中学会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提高政治认知、锻炼政治技能、增加公民修养,进而使当代民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归民主的本来面目。在佩特曼看来,自由主义民主以公民参与资质和能力不足为理由来限制和对抗民主的参与要求,却忽视了良好的参与技能和民主素养只能在公民参与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塑造,而卢梭、约翰·密尔等人对参与教育功能的论述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佩特曼认为,卢梭是参与式民主理论家中最早也是最为卓越的代表。在卢梭看来,一个参与式政治体系能够保证个人的自由,因为公民只有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和体认自由的价值,只有通过参与,个人才成为自身的主人,因为一个人的自由不能包含其他人的意志,任何一个没有成为自己主人的人都是不自由的;另一方面,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公民逐渐学会了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学会了辨别个人欲望和公共利益,感受到了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和作为一个利己私人的不同。总之,参与能力的提高和公民素养的增强只能在实际参与的过程中实现,参与越频繁,参与的动机和能力就越强;更为重要的是,在参与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公民属性为参与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维护作用,因为参与培养了公民个人的社会归属感,同时也使集体决策更容易被个人所接受。

密尔拓展了卢梭的观点并把这些结论运用到对大规模社会的分析中。在密尔看来,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教育功能。政治制度对人们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而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精神尤其是人们的知识、品德和政治素养是判断政治制度好坏的标准,因此评价一个政府是不是好政府并不能依靠边沁式的纯粹保护性的功利主义标准,而是要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公民的能力、道德和知识,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事业的管理。密尔认为,大众的、民主的政府是实现教育功能上具有积极意义,所以民主制度才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在个人、个人品质和心理特征与政治制度的类型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而负责任

的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政治行动所处的那种制度——即卢梭理想的参与性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公民通过参与获得的性格品质会通过参与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而政治体系也就获得了一种自我维持的能力。

在佩特曼看来，以熊彼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误解了以卢梭、密尔为代表的古典民主理论家，他们一味地强调代议制，偏爱精英，厌恶公民参与，把选举等同于民主，“从未解释参与在早期民主理论中的地位，或者为什么在一些理论中参与被赋予如此高的地位，这就需要有关的理论进行仔细地检视。……正是后者（指卢梭和密尔）提供了一套实现政治民主所必要的特定方案和行动计划：通过‘公共教育的确能够实现政治民主，而公共教育必须依赖于社会许多领域中对广义政治活动的参与’”^{[2]18-19}。由此，佩特曼主张用参与式民主的核心概念来修正自由主义民主对“政治”、“参与”和“民主”的歪曲：参与式民主认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工业领域乃至各级政府等日常的社会化场所和机构都是权威运作的环节和领域，简言之，这些领域本身就可被视为一种权威结构。在权威结构中，参与首先指平等地在权威机构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参与管理；其次，参与指公民个人能够通过不同的程序深入或者影响管理活动的核心，即决策过程中。而民主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公共事务而在所有与该事务有关的公民中寻求共识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民主的核心就是参与^{[2]40}。

三、参与式民主的关键：工业领域及工作场所的参与和民主

以卢梭、密尔为代表的古典民主理论家为参与的教育功能提供了大量的论证，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参与性的社会应当如何构建呢？换言之，公民参与应当首先从什么领域、从哪一个层次开始呢？在佩特曼看来，公民参与技能的培育应当从公民日常工作的领域开始，因此，工业领域和工作场所是参与式民主的关键领域。

在佩特曼看来，参与式民主最终需要一个参与性的社会，即依靠一个完全实现了权威结构民主化的社会来支撑，而参与式民主的构建成功与否，要看个人的参与行动是否真的能够带来权威结构的民主化，而相关假设的证成最关键的是要看公民的参与行动能否首先促使个人生活和工作场所的民主化，因为相对于整个权威结构而言，工作场所是与个人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地方，个人一生中绝大多

数的时间是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中度过的。如果个人的参与行动能够在提高公民素养、锻炼公民政治技能方面发挥作用，进而使基层的权威机构率先民主化，那么参与的教育功能就会具有实践依据，同时参与使基层权威结构的民主化也为整个权威结构的民主化带来了希望：首先，工作场所和工业领域为公民在初级层面学习如何管理公共事务提供了场所，传统的政治系统要求公民在参与行动的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完善的政治认知、全民的政治技能的优秀公民，这一不切实际的要求使许多公民被排除在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之外，因此，工业领域和工作场所作为公民参与教育的起点，其功能其他领域无法替代的。其次，工业领域中权威结构固化的根源在于“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固定的角色差异，这种固定差异的实质在于管理者负责决策，而工人只能按照决策从事生产。工业领域和工作场所的参与式民主改变了传统工业领域中的权威结构，它鼓励普通工人参与到与自己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决策环节中去，改变由于生产和工作角色差异导致的权利和地位不平等。这一主张为个人平等独立地参与，通过参与获取政治效能感，进而为扩大参与的领域和范围提供了条件。密尔曾指出，“人们如果没有地方层次上的参与准备，全国性政府的普选和参与是没有用的。正是在地方层次上人们学会了如何管理自己……大国中的个人往往能够有效地参与‘巨大社会’的管理。那么，进行这种参与所需的品质就必须在社会基层中得到培养和发展……正是通过在地方层次上的参与活动，个人才‘学会了民主方法’……只有通过小范围地实践大众政府的活动，才能在更大规模上学会如何运作大众政府。”^{[2]29}在密尔的启发下，佩特曼设想：“如果工作场所中的这些参与成为可能，那么工业活动中的权威关系将从现在的上级与下级（管理者与员工）的关系，变成整个员工与选举产生的管理者（领导）之间的平等合作的关系，就像在地方层次上选举代表那样。也就是讲，工业领域的政治关系（在广义上使用‘政治’一词）将不得不民主化，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发展。”^{[2]32}

四、参与式民主的实践模式：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工人自治

为了防止参与式民主沦为乌托邦式的幻想，佩特曼认为必须在实践领域中检验参与式民主的核心主张，而工作场所与工业领域中参与是检验普通公民的参与行动与参与式民主构想之间实际关联的关

键领域。可喜的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工人自我管理制度在整个国家经济领域的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实践,为参与式民主及其理论提供了引入大规模工业民主的实践例证^{[2]82}。

(一) 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工业组织结构

在南斯拉夫,每个工业企业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管理;工人委员会由整个企业中各个选举单位集体(所有工人)选举产生。根据法律规定,所有超过7个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建立工人委员会,但是如果企业人数不足30人的,由所有的工人组成委员会。在更大的企业中,工人委员会的规模从15到120名不等,平均为20到22名。大企业可以根据需要选举部门委员会。1961年后,一种在南斯拉夫称为“经济单位”的制度开始建立,每个企业被分成小的生产单位,生产单位实行自治管理,这些单位的组织活动由企业负责,单位的管理权在整个企业工人大会手中。

工人委员会的任期为两年,成员可以由选举者罢免,每个月定期召开会议。工人委员会内部有小组委员会处理特定事务。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不一定全部来自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从它自己的成员中选举产生执行机构,通常是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从3名到17名不等(包括厂长),任期一年,连续当选两次则卸任后两年内不得参选。管理委员会每周举行几次会议,主要功能是监督厂长工作、起草企业年度的计划、保障企业计划的实现。其他法律规定的“管理组织”除了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以外还包括厂长。厂长职位的候选人选择权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中,厂长任期四年。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委员会、厂长一起管理企业并负责执行工人委员会的决定。

(二)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工业民主与政治民主

在南斯拉夫工业组织与政治结构的相互关系方面,佩特曼发现了工业领域与政治结构之间民主化的相互关联。她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工人委员会自然会受到国家政治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共产党对工人委员会施加的影响和控制上,这些作用主要通过如下途径实现:第一,共产主义联盟通过让自己的党员当选为社区大会的成员影响工人委员会。第二,共产主义同盟通过工会的教育功能实现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第三,通过将自己的成员选举进工人委员会来实现共产主义同盟对工人委员会的影响。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工人管理组织如工人委员会等也直接参与国家最高管理层或中高级管理层的许多具体的决定和政策事

务,这些事务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生产——财务类”(生产计划、工资和机器的销售)等传统上属于高级管理层的事务;其它两类主要是“组织维护”和“个人需要”的事务。后来的研究表明,企业工人委员会在最重要的高层管理方面的讨论越来越多了,这表明工人委员会事实上能够摆脱专业的管理者的限制,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那些超越他们低层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事务,并逐渐地增强了运作该制度的能力。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参与具有教育功能的认识,它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培养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形成了更具有实用性的政治参与能力。同时,由于工业结构和政治结构紧密相连,工人委员会负责决策这一特点,揭示了工业领域民主结构扩大到政治结构的可能性,即“政府”的选举过程和管理实践将深深地受到工业领域中具有优良政治品格和政治技能的工人的影响,工业领域中的参与成就直接嵌入了政治领域的参与活动中。

在佩特曼看来,南斯拉夫参与式民主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探索现代大规模工业领域的直接民主和自治提供了借鉴:首先,参与式民主主张权威结构的民主化以打破工业领域和工作场所权威结构的固化为前提,而南斯拉夫管理组织中频繁轮换管理人员改变了工业领域和生产过程中“管理者”和“工人”的角色固化,为普通工人参与决策提供了条件。其次,参与式民主主张公民应当能够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管理制度赋予每位工人一人一票,就企业的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决策,这一制度保证了工业领域中的每个人都有至少一次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在佩特曼看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自治模式的成功使参与式民主获得了现实的依据,“很显然,寻求更多的参与,以及参与民主理论本身,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建立在一种危险的幻觉之上,也不是建立在过时的、非现实的理论基础上的。我们仍然拥有一种现代的、富有生命力的、以参与为核心的民主理论。”^{[2]103-104}

五、佩特曼参与式民主理论对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启示

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重新思考了民主、参与等民主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概念,指出了自由主义民主对民主概念的改造实际上偏离了民主的要义,不仅扰乱了人民对民主的正确认识,在实践领域中也造成了较大危害。参与式民主通过构建一种参与性的民主社会,修正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弊

端,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当代自由主义民主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权威结构的固化及其对公民参与的拒斥,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首先,佩特曼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和对民主本质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这种民主与自由主义的民主有着天壤之别。自由主义民主认为民主是政治家的统治,民主的核心就在于公民选择替自己做出决策的人。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不仅指人民主权,还指人民意志的实现,它主张人民自己创造、建立和运作国家制度和国家权力,并要求人民能够运用国家权力和制度来决定自己的事情。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4]316}因此,“民主制度的独有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4]281}列宁曾指出,所谓“发扬民主,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5]在列宁看来,全体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民众必须在社会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参加政治生活,并根据人民群众亲自参与政治生活的体验对他们开展开始管理国家事务^[6]。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人民主权发展为“人民民主”的概念,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具有的最广范的民主”^[7],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人民的国家,选举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8]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劳动者共同享有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民主。”而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要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9]。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作为主人管理自己的国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地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把社会主义对民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10]社会主义民主对人民主权和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一贯强调,体现了社会主义相比于资本主义的巨大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已经在参与式民主对自由主义框架内公民参与的衰落和民主危机的探究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第二,佩特曼指出了公民参与是民主的核心,分析了自由主义民主漠视公民参与所带来的危害。在佩特曼看来,参与是民主的核心,通过参与来逐步培养积极、理性、负有政治情感的公民是民主的归宿。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民主实践和根深蒂固的民主观念中,参与一直被视为民主的精髓,从古希腊开始,参与就和民主密不可分。城邦民主把公民参与政治视为公民应尽的义务,同时还将参与视为公民资格之所在,正因为如此,城邦民主体制下如果某个公民不参与政治,这就意味着这个公民丧失了公民资格,将与奴隶和动物无异。近代的卢梭、密尔等主流思想家也把参与视为民主的核心,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民主必须保证所有公民能够充分、直接地参与公共决策,只有在大众参与的情况下,负责任、妥协、包容、平等和自由的民主价值才有可能实现。而当代自由主义民主歪曲民主的核心要义,以公民素养不足为由公然拒斥公众参与,造成了当前自由主义民主实践的困境与危机。当代自由主义民主借助代议制机制尤其是庞大的官僚机构抑制了个人的自由,消解了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导致了普通公民日渐疏离公共领域;自由主义民主崇尚精英蔑视大众,以公民素养不足为由拒斥公民参与进而阻挠权威结构的民主化,导致了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权力结构的长期固化和普遍的不平等;最后,自由主义民主一味地强调公民政治技能不足,却对培养公民政治认知、提高参与技能条件不足的情况视而不见,过度关注于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导致民主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失衡,最终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体系几近瘫痪。佩特曼的参与式民主理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所做的对比使我们坚信只有切实贯彻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逐步扩大公民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域,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有效途径,才能不断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命和活力。

第三,佩特曼通过对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检视,肯定了大规模工业民主及其向政治民主扩展的可能性,为我国基层民主实践环节中对工业企业领域民主参与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把企业的民主管理同工人阶级的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联系在一起,认为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并不单纯是一个管理方法的问题,它关系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以及当家做主的权利能否真正实现。1957年,全国公有制的企业中开始普遍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企业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环节的地位进一步明确,而且从理论上对企业民主管理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证。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工业企业中职工代表大会权力逐渐扩大,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肯定使企业民主管理得到了切实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宪法、全民所有制工业领域中的企业法、劳动法、工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领域中的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修改和颁行,使我国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有了具体的规定和保障:职工对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计划和方案有审议建议权;对奖金、工资、奖惩和劳动保护等规章制度有审查通过权;对事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相关事项拥有审议权和最终决定权;对企业管理者拥有评议权和监督权;对企业管理者拥有推荐权或选举权。长期的实践证明,工业领域和工作场所中的民主制度在协调劳动关系、实行民主管理、保障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贡斯当.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98: 324.
- [2] 佩特曼. 参与和民主理论[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 [3] 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415.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 列宁选集(第2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111.
- [6] 列宁选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04.
- [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760.
-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6-1477.
-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68-175.
- [10]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 人民日报, 2007-10-25(1).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R]. 2005-10-19.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Industrial Field and Work Place Carol Pateman's Theory about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Its Significance

LI Peng

(The Party School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053 China)

Abstract Liberalism ignore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demos and reconstructed the classic democracy, which put liberal democracy into great crisis and made the democracy comedown. In order to save the democracy, Carol Pateman claimed that the essence of democracy lies in the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life. She protested the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expanded from the economic field to the political field so that a completely democratized society can be formed. This opinion about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dicated the start of moder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roused a great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 and also provided the reference to the practice of democracy in China at present.

Key words Pateman;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liberal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socialist democracy

编辑 张莉